

人类共同价值论与西方普世价值论的差异性及应对策略研究

额旻 李珏漪

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3

摘要: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成为了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议题。本研究旨在探讨 人类共同价值论与西方普世价值论之间的差异性, 并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首先, 本文界定了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理论基础。其次, 文章深入分析了两种价值体系在目的性、服务对象、实践路径及道德领域与内在特性方面的根本差异, 并讨论了这些差异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影响。最后, 针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广泛影响, 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抵御其负面影响的策略。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 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衡的国际价值对话平台, 确保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发展, 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关键词: 人类共同价值; 西方普世价值; 差异性; 全球化; 应对策略

引言

“普世价值”论者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出发点, 实质上是一种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霸权行动。而马克思的人性论对人的普遍价值的重视, 与其他人性论相互补充, 构成了一个多维度、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二者在根本上存在着目的、服务对象、实践路径以及道德领域和内在特性上的差异, 在全球化背景下, 要有效抵制西方普世价值入侵, 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加以防范。

1. 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理论基础的界定

1.1 基于抽象人性论的西方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说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 认为人的本性自人类诞生起便永恒不变, 独立于社会和经济条件, 从而忽视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观具有永恒性。抽象人性理论在西方普遍价值体系中体现为对个体尊严、理性精神、自由和创造力的重视, 强化了“人是第一”的思想, 但也因其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导致悲观主义、迷信主义等负面影响。

此外, 抽象人性理论在西方普遍价值中表现为对人权价值的双重认识, 既将其视为抽象价值, 又强调其在具体生活中的实践。这一过程是人权价值观从抽象走向具体的关键^[1]。然而, 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西方普遍价值, 实质上是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霸权, 起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强调个体自主性, 主张社会制度应以个体为基础。表面上追求人类共同价值, 实则西方利

益服务, 甚至通过“颜色革命”等手段推行意识形态霸权, 忽视人性的现实需求, 成为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的体现。

1.2 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人类共同价值

马克思的人性论强调人的普遍价值, 与其他人性论共同构成多维有机整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提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需要即是人的本性”三个命题, 内在逻辑统一, 体现人性论的多维互动性。马克思还强调通过实践改变劳动者的“非人性”状态, 推动建立“人道的社会”, 消除私有财产^[2]。

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 批判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 强调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本质。它不仅解决理论难题, 还为人类全面发展提供指导, 对解决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信仰危机和集体归属感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马克思的人性论, 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包含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制度与人性在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 制度的产生与变化反映人性发展的需求。这一理论既是对人的认识, 也是全面发展的指引, 为制度变革提供理论基础。

2. 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差异性

2.1 目的差异

西方普世价值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基础上, 旨在推广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模式, 其目的是维护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与道德伦理^[3]。其核心是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

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甚至通过“改旗易帜”扰乱他国心智。二战后，西方政客将普世价值作为意识形态武器，推动其和平发展策略，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

相比之下，人类共同价值论旨在推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全球传播，超越政治经济范畴，涵盖文化、社会、环境等领域。它强调超越地域、民族和肤色差异，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汇聚多元文明价值观。其目标不仅是实现具体政治或经济目的，更关注人类福祉与全球治理，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公平、可持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4]。

2.2 服务对象差异

“普世价值”是由西方反对封建主义的解放运动而提出的，自其出现以来，便以西方资产阶级为主要目标。尽管普遍价值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反封建的斗争，但是，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在世界上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贪婪驱使着他们以“民主”、“人权”为口号，编造谎言，哄骗那些已经脱离封建统治、谋求更美好生活的工人阶级，并且用各种手段来掩饰不公平的恶性竞争，颂扬卑鄙的资本掠夺行为。而现在，西方世界所鼓吹的“普世价值”，无非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而人类共同价值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指向那些在全球化、国际关系以及全球治理中寻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等普遍价值的人群。这种价值观超越了地域、种族和肤色的差异，也超越了文化的界限，实现了对各种文化的共同认同。从广义上讲，人类共同价值理论的服务对象，是指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追求和平、发展、公正、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的群体。这些人中，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但是，他们都在为建设更好的世界而努力。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改革，促进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

2.3 实践路径差异

普世价值强调的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抽象的理念，它的实现途径趋向于零和对策，具有排他的性质。从现实途径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是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输出，企图把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强加于人。这一举措不但是为了改变他国的发展方式，更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但是，这一制度却受到了不同文明的抵制与批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走和平发展之路，这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这一发展路径强调以和平的方式推进全球化，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共同价值观中的和平、繁荣、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它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开放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这一举措，不但促进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将为世界营造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更加和谐的世界。

2.4 道德领域与内在特性差异

普世价值常常源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以民主、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与多元文化的价值体系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普世价值在伦理层面上会忽视或漠视个人的差异和文化情境。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对道德问题的认识与建构也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普世价值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现代的、世俗的概念，其实质是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的，它说明了普世的价值观并非对一切文化、任何族群都适用。

与此相反，在伦理层面上，人类共同价值论更多地关注全球事务，例如，公正，民主，自由，这是整个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一理念从人类整体出发，尤其是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和平、繁荣、和谐与稳定等全球性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它趋向于超越国家、民族、国界和信仰，努力构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不仅限于西方，更是要将其融入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之中。

3. 全球化背景下有效抵御西方普世价值入侵的策略

3.1 强化本国文化与价值观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要想有效地抵抗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侵略，就必须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其中包括加强教育系统内的历史，语言，艺术，哲学等课程，并透过传媒及公共政策，推广自己国家的独特与优势。在全球化趋势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既是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手段，又是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它包括法律保障，财政支持，国际合作等。在资讯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藉由网际网路、社交媒体等现代化的沟通工具，将自己国家的文化有效地传播至世界各地，并加强对外来文化的监控与回应。与此同时，对西方“普世价值”，尤其是民主与自由等领域的双重标准与

政治陷阱进行甄别与揭露，未必能够在任何一种文化与社会环境中都发挥作用。

“人类共同价值始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和补充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形式”^[5]。在意识形态谱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6]。作为中国强基固本、凝聚人心的根本价值取向，与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有着共同之处。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为此，要把二者的培养结合起来，对挑衅性和侮辱性的言论进行强烈的批判，避免潜在的性话语陷阱，把弘扬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念融入到主流价值观的建设中来。

3.2 积极参与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抵御西方普世价值入侵的策略之一是积极参与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这一战略既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又有利于促进和保护本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多边主义为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开放的基础上开展对话与磋商，以化解世界上的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主义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之一。中国通过积极参加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展现出责任感、带头作用，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做出贡献。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大力倡导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双赢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样，中国不但可以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且可以有效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发展观念传递出去，避免西方国家企图推行的单边主义或强权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国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等多边机制的建设，促进了国际合作，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一举措，既推动了地区经济的融合，又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3.3 增强国家治理能力

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包括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及通过法治保障国家治理的长期性、全局性和根本性。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运用也成

为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的一种重要途径。信息

化能够优化政府管理过程，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准确性，进而更好的应对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中国在面临西方价值观冲击时，既要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又要提高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认识与理解。其中，就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意识形态建设，避免外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无序入侵。而基层治理又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因此，必须统筹协调，通过强化基层治理，实现对社会事务的高效管理，提高国家治理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才能更好地提高我国的治理活力与效率。

从整体上看，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加强国家治理是对抗西方普世价值的重要手段这就需要 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增强文化自信、提高治理效率。

参考文献：

- [1] 梅春英. 西方普世价值论的哲学基础批判 [J]. 大庆社会科学, 2020, (05): 30-34.
- [2] 周世兴, 程琳琳. 论马克思的“人性”概念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57(04): 5-12.
- [3] 杨伟宾, 李学勇. 共同价值: 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人类共享价值 [J]. 思想教育研究, 2016, (09): 63-65.
- [4] 潘从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 [D]. 湖北大学, 2020.
- [5] 易刚, 林伯海. 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探究 [J]. 思想理论教育 (综合版), 2016(7): 40-43+77.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作者简介：

额筋 (2001.9—)，女，汉，云南普洱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 工作研究

李珏漪 (2000.6—)，女，汉，云南曲靖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 工作研究。